

苦寒的拂晓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内幕

约翰·纽豪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John Newhouse

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
温斯顿出版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苦 寒 的 拂 晓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内幕

[美]约翰·纽豪斯著

齐沛合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270,000 字

1974 年 5 月第 1 版 197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57 定价 1.4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约翰·纽豪斯曾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工作，并在华盛顿和国外从事政治、外交方面的写作多年，他写的《戴高乐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书曾受到重视。本书是作者同许多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交谈后写成的，书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来龙去脉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并提供了一些内幕情况，对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着重叙述苏美两霸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背景、双方会谈的意图和勾心斗角的情况，以及斗争的焦点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1968年苏修侵捷前后到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这一时期，叙述较详。作者对美国内部的争论透露较多，对双方参与会谈工作的关键人物也作了一些介绍，但对维也纳和赫尔辛基会谈的具体情况及苏联内部的争论叙述稍略。书中所述充分证明，“和缓”、“裁军”的调子唱得越高，争夺核优势的竞赛就越激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本身充分暴露了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实质，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两个超级大国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狼狈处境。

书中提到两霸特别是苏修对中国发展核武器惊恐万状,作者说,“中国虽然在舞台外无声地存在着”,“却始终起着深刻的影响”。作者透露,在谈判期间,苏修曾千方百计阴谋勾结美帝对我进行核打击。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作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核竞赛的,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书中有一些错误的论述。

本书提到的技术名词和组织名称很多,全称往往很长,而且一再出现,为了便于阅读,除第一次用全称外,以后出现时均用简称。正文旁的边码和索引中的页数均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注意。

1974年3月

2095/31

序 言

《苦寒的拂晓》一书记述了苏美之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背景和情节。本书内容自然是有关当代的，其高潮是1972年5月26日在莫斯科达成的几项历史性协议。历时三十个月之久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阶段以达成这些协议而告终。会谈的第二阶段也将是漫长而又极其困难的，看来至少会持续同样长的时间。

虽然会谈的持续不断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会谈本身十分敏感，要求严守秘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国际谈判都是幕后进行的，而超级大国之间关于武器的谈判尤其不能公之于众。关于这一类当代史实，作者必须依靠直接参与其事的人愿意如实地谈出内情。作者对他们的话必须仔细鉴别，要考虑到他们会有个人偏见，他们所代表的机构有着既得利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个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对现实的观察会有所歪曲，甚至使他们意气用事。就是从某个政府部门所得到的消息，也要尽可能与其他部门得到的消息加以认真的核对。

本书使用的材料多半是从大量私人谈话中得出来

的，而与此有关的人，除极少数外，是不能透露姓名的。政府各级机关里的许多人（有的仍在担任公职，有的已经去职）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诸如配置反导弹导弹的决定这样一些有关的和有争议的问题获得认识和理解。我对他们深为感激。他们对本书的结论或观点当然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我也要对威廉·肖恩表示谢忱。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兴趣以及因而在《纽约人》杂志上连续登载本书，给了我很大勇气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我还要向本书的编辑玛丽安·伍德夫人致谢，感谢她自始至终给予协助，为本书出了不少力。

约翰·纽豪斯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揭开内幕	1
第二章 来龙去脉	103
第三章 准备就绪	159
第四章 内部争吵	204
第五章 重大谈判	253
附 录	417
索 引	431

第一章 揭开内幕

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某年间，白厅有过一位文官，喜欢用一句话来告诫来客，他把这句话写出来配了镜框，挂在他办公桌背后墙上，文曰：“自以为知，实非真知”。这位职业怀疑论者的姓氏、生平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人们觉得，即以他和他的同代人而言，恐怕也未必处理过什么事情，有如“SALT”，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下简称“会谈”——译者〕，所涉及的问题这么错综复杂，这么勾心斗角，这么似是而非，这么矛盾百出，这么虚无缥缈。时至今日，“SALT”一词早已列入缩写词汇而尽人皆知，可是它的实质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还只限于一些行家——有工作关系的各种官员、科学家——才知道。即使这些人中，也还有不少茫茫然的。他们的看法摇摆不定，这是因为对“会谈”所进行的分析简直无法使人得出任何有条有理、直截了当的观点。

然而，对“会谈”进行认真的考虑，也是公民的天职。政治家和社论主笔（这些人并不是个个都爱夸张的）告诉我们，“会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命运攸关的谈判，但是

他们很难解释清楚谈判究竟争论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争论。1972年5月在莫斯科达成的一些协议（可能是一系列协议中的头几个），在国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一般认为，正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核扩散条约没有被否决一样，“会谈”达成的协议也不会遭到否决。但是，关心“会谈”的公众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对“会谈”的内情的了解，却比那两个条约少得多，而那两个条约涉及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引起争论，并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会谈”这玩艺儿很古怪：它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却又不易理解。然而，即使不是专家，不是内行，也并非了解不了。况且，对“会谈”加以考虑，熟悉一下它所涉及的问题和目前的情况是很有好处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会谈”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不如说这是因为这个“会谈”大概称得上是维也纳会议以来最引人入胜、最丰富多采的一次谈判了。“会谈”或许要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但是，纵然进展缓慢，间或不免陷于停顿，这个“会谈”对整个体系产生的影响却会与日俱增，足以和维也纳会议相媲美，而维也纳会议的成就是它曾在一百年中使欧洲免于遭受任何重大的流血。这就是希望之所寄。

谁要能掌握下述三点情况，才可以说对“会谈”的内幕奥秘有所领略：一是美国和苏联为什么要搞这笔独一无二的大买卖？二是“会谈”为什么那么难于捉摸？三是

“会谈”的实质问题何在？

问题首先是，为什么华盛顿和莫斯科竟然会在战略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答案（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不完全）将判断“会谈”是否能够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以及这种协议是否能够真正使大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均势，也就是说，使双方追求战略优势的劲头有所收敛。

卡瑟尔累当年曾对英国下议院说：“维也纳会议不是为讨论道义原则而召开的，它是为了伟大的实际目的，为了实现普遍安全制定有效的条款而召开的。”^①卡瑟尔累的这句名言大可移用于“会谈”。但这个“会谈”确实十分复杂：参与此事的高级官员和中级官员对超级大国为什么要搞“会谈”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很少有几个相同的。实际上，甚至在是否应当举行“会谈”的问题上，也还有意见冲突。当然，政府犹如个人一样，很少只是为了某一个明显的理由而作出重大决定。再说，促使官方采取行动的动机也容易被行动本身或行动的词藻外衣所掩盖。“会谈”正象多数重大行动一样，表现了这种倾向。

尽管如此，对于举行“会谈”的理由，仍然有一种一致的看法。设想如果有一位高级官员出席一个军备控制问题讨论会，会上有人问到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举行这个

① 哈罗德·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 《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 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 1946 年版, 第 187 页。

“会谈”，他大致会这样回答的：

举行这个谈判，不是出于要求裁减军备的共同愿望，而是出于希望把均等原则确定下来的相互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使每一方都确实认识到，在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一次核进攻之后，后者是有能力作出使前者忍受不了的还击的。（这里的假设是：如果双方的报复能力都强大到足以在经受对方的打击后还能保存下来，那么哪一方就都不会发动第一次打击了。因此，相互威慑的局面是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报复力量，或第二次打击力量的认识之上的。）这样，双方都可能认识到，无限制的军备竞赛会破坏威慑、从而破坏稳定局面，因为可以想象，只要一方稍占优势，就会产生第一次打击的危险。而且，如果不加限制，就可能造成一种无限地争取更多更好的核武器的形势，从而迫使军费不断上升，这就可能影响到其他重点开支。这样，卡瑟尔累的“普遍安全”，即原子时代的同义语“稳定”，也就会受到损害。

由于涉及国内政治、外交政策、相互竞争的重点国防项目等方面的原因，两大国都想把军备开支稳定下来。两国都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规（有别于战略的）防御力量。两国都面临着要求重新调整重点开支的内部压力。即使整个美国国防预算能够稳定下来，或者还能有所削减，那末今后几年节省下来可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国防费用的比例还要提高，那就会损害

一些社会改革的计划,并使另外一些计划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的这位高级官员会继续说,每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和目的都有一套冷静的、分析性的假设。它们各自假设,对方所以要谈判,是因为已经出现了均等局面。每一方都怀疑,对方可能采取“一面谈判,一面试探”的手法,来争取时间,以便在数量上(武器数目)或质量上(现有和今后的武器系统的毁灭能力)赶上或超过对方。

他还会说,俄国人参加谈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战略武器上已经赶上了美国。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受到挫折后,力争在第二次打击力量方面与美国人并驾齐驱,他们的努力已经成功了。现在,苏联领导人同美国领导人一样,也希望避免在进攻性武器方面再一次发生循环上升的大竞赛。他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禁止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见解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说得露骨一些,就是说,在一切战略选择方案中,保卫人民是最头痛的事,因为要保持稳定,苏美两国社会就势必要全部暴露在对方的毁灭性打击力量之下。苏联接受这种严峻而新奇的原则,说明苏联的想法日趋老练,已经多少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态度,包括“保卫领土就等于安全”的传统俄国观念在内。这一来,不禁使美国对苏联的兴趣大增,要好好地帮助苏联开开窍,设法同苏联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不管一时进展多么缓慢,最终会把美国和俄国在稳定威慑方面的想法捏在一块,趋于

一致。纵使对内行来说，考虑威慑问题也是大伤脑筋的，它需要时间，需要对武器和争论的问题有所研究才行。

在威慑问题上的思想差距，不仅存在于美国战略界和俄国人之间（俄国人只是最近才关心这些概念的），而且也存在于美国人和他们的欧洲盟国之间，存在于那些直接卷进去的美国人（“直接参与者”）和那些冷眼旁观的学术界人士之间。

双方坐到一起举行谈判，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各自的国内政策问题。“会谈”迫使两国的政府机构不得不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决定（尽管方式不一样）。在美国体系中，“会谈”迫使相互竞争的各方面解决分歧，采取某种可能是自我限制的步骤。总之，“会谈”使双方可以做某些它们反正要做的事。把一些双方各自想做的事作为双边协议的一部分来办，总比单方面在国内来办方便一些。用官场术语说，这是一种办事的“万全”之策，因为另一方，即敌手，也已在同一张纸上“签字画押”了，而且双方已就他们所谈判的问题达成协议。这一点本身就是新奇的，也是关键性的。

我们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如果他代表国务院或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以下简称裁军署——译者〕，可能会在回答为什么要举行“会谈”这个问题时，最后谈一谈均等问题。他会说，如果不搞均等，那么就要追求优势，然而这种所谓优势，当双方经常保有确能毁灭对方大部分社会

的能力时，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因此，对俄国人来说，均等的局面也许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俄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拥有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力量，并且利用这种力量扩大其政治势力范围。欧洲人现在担心，一旦事急，美国更加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军队，保卫欧洲了。同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注意到，同样不断增强的苏联常规武装力量，已经足以成为支持苏联的冒险、甚至侵略性外交的后盾，而极少可能有同华盛顿进行核对抗的危险。因此，均等有其战略价值，也有其政治价值。

正象一国政府很少仅仅为某一个理由而采取行动一样，政府各部门也往往由于很不相同的理由而同意采取某项行动。人们认为，至少苏联政府的一些部门赞成在“会谈”中采取一种慢条斯理的谈判手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法来窥探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组织——译者〕的那些欧洲国家政府对这种谈判的疑虑，然后在可能条件下诱使这种疑虑发展成为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公开分裂。对也罢，错也罢，总之双方各对其敌手的谈判动机疑虑重重，上面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维也纳会议的步调和风格最后终于使塔列朗^①感到

① 塔列朗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 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出席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以权变多诈著称。——译者

不耐烦了。据哈罗德·尼科尔森^①对维也纳会议所作的精彩描写,塔列朗特别不耐烦的是“卡瑟尔累的谨小慎微作风和梅特涅喜欢把问题搞成象翻线游戏那样烦琐复杂的恶劣习惯。”^②尼科尔森还引证塔列朗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梅特涅亲王在这次会议期间,充分暴露了他的庸碌无能,善弄权术,醉心邪道,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夸夸其谈的惊人本领。”^③

人们倒想知道,这位欧洲最杰出的外交家如果活到今天,会对“会谈”作出什么反应。如同维也纳会议一样,“会谈”也是一次为了寻求旨在使大国感到安全的均势的政治谈判。但是,维也纳会议的中心问题是纯政治性的(对波兰和萨克森的控制权);“会谈”却不同,它是一个技术问题纵横交错的大杂烩,其内容如此繁杂,就连要想对某些定义和职权范围取得统一认识都很困难。“会谈”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是双方都利用技术问题来支持他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偏见。

要了解“会谈”,就必须透过这一类现象,揭开内幕:如秘密的谈判过程;使美国人或者说许多美国人大吃一惊的神秘作风;“会谈”的神话;由于美国国内所谓防务界

① 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 1886—1968), 英国外交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译者

② 哈罗德·尼科尔森:《维也纳会议》,第176页。

③ 同上。

和军备控制界内部的尖锐冲突而造成的混乱，以及苏联在有关“会谈”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混乱。

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象这样引人注目的谈判，其严守秘密的程度，如果不说是空前，至少也是很罕见的。谈判一开始，双方代表团就郑重地达成协议，禁止用泄露谈判情况的手段来取得宣传上的好处。在导致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漫长的谈判中，双方代表团的成员忠实地遵守了这条保密规定。但他们在华盛顿的一些同事却不时透露一些谈判情况，这种违反协议的行为，往往引起一时针锋相对的报复：在发现美国政府故意透露了美方立场的时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就会出来澄清苏联的立场。相反，遇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泄露了谈判情况，美国政府也会出来澄清。

双方代表团对泄密都表示遗憾，不管是谁干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们由于对“会谈”都有主人翁感，因此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罗伯特·托思可能不知道，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三轮“会谈”期间他曾受到双方代表团的共同谴责。原来当时华盛顿有人告诉他，俄国人刚刚接受了美国的一个建议，内容是反导弹防御只限于设在两国的首都莫斯科和华盛顿。事实是，美国人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而后来令人懊恨不迭的是俄国人也的确接受了。

但是，美国人经过冷静考虑之后，改变了这个想法。因此，参与“会谈”的人大都对托思的报道深感恼火。那篇报道发表在1970年11月26日的《洛杉矶时报》上。看来，任何泄露都使俄国代表团不快。

谈判的深奥内容也有助于保密。被选中为透露“会谈”消息渠道的记者很清楚，报纸的篇幅有限，不允许他把自己的珍贵消息（往往得之不易）写成一篇至少能让《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严肃读者可以看懂的报道。有关“会谈”的秘密往往是由这两家报纸泄露出来的。把任何一篇有关“会谈”的报道压缩到一千至一千二百字是困难的，而通篇又不免都是一些缩写词、简称和战略武器术语等这些和“会谈”分不开的东西，很难引人入胜。7 这些报道使许多读者读起来实在太伤脑筋了。这一点报纸编辑深有体会，因此他们对“会谈”不很感兴趣。

在关于“会谈”的文章中，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不多，而且大都是专题性质的，因此即使细心看报的读者也无法对谈判形成一个及时和连贯的看法。泄露出来的秘密，不管来自美国方面或者苏联大使馆，当然都是为自己这边服务的。在美国方面，这种泄密可以是白宫、国务院或者五角大楼某个部门授意的。从苏联大使馆泄露出来的秘密则来自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或者更多的时候来自他的公使衔参赞尤里·沃隆佐夫。沃隆佐夫是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自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军备控制